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奋勇前进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历史背景简介

(内部资料)

广东化工学院图书馆资料组编

一九七七年五月 广州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历史背景简介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写作时期1949年9月——1957年11月，是我国的社会性质发生革命转变的历史时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这八年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渡过的。毛主席在1957年回顾这八年的历史时指出，“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排除了党内外阶级敌人的干扰、破坏，使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断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就是这个胜利的伟大纪录和科学总结。

下面，我们按照历史顺序，把这个时期的重大政治斗争和历史事件，作一概括的介绍，供师生员工参考。

一、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三年，指的是1949年9月到1952年10月。三年当中，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极其错综复杂。1949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西北进军。当时，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仍有两百万反动军队和上百万土匪、特务、游击队反动武装，有待我们消灭。直到1950年上半年，解放战争才在大陆上基本结束。1951年10月，人民解放军根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进驻西藏。至此，除台湾和金门、澎湖、马祖等岛屿外，祖国大陆全部解放。接着，进行了抗美援朝、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斗争，开展了对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

1. 回中国的遗产——一穷二白、凋敝残破的国民经济

国民党反动派遗留给我们的中国经济，是一个极其凋敝残破的烂摊子。抗日战争前，国民经济已为帝国主义所控制，据不完全统计，1936年全国煤、铁矿石、电力、棉纱、棉布、火柴、纸烟七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外资经营或控制的厂、矿生产量占七种产品总量的46.9%，其中煤55.7%，铁矿石99.2%，发电量55%，棉布64%，纸烟58%。1937年，全国二万多公里铁路，外资控制的占90.7%。航运船只吨数外资占69.5%。美、英、法、德、意、日等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达32.425亿美元，每年纯利5亿美元以上。抗日战争以后，美帝国主义垄断了中国经济命脉，美资在中国的垄断性公司约有三百家，1946年，美国占中国进口贸易的53%。

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是美国垄断资本在中国的走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多年中，聚敛了200亿美元以上的巨大资本。到解放时为止，全国3489家银行中，有2448家控制在官僚资本手中，单是官僚资本的“资源委员会”，就掌握了全国钢铁产量的90%，煤33%，电力67%，水泥45%，糖90%以及全部石油和有色金属。估计官僚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所占比重约达80%以上；此外，又控制着全国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全国45%的轮船吨位。

在农村，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8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总共只占有约20—30%的土地。实物地租占农民收入的50%左右，有的高达70—80%。每年，全国农民约向地主交纳三千万吨以上的粮食。封建地主、富农绝大部分又是高利贷主，据浙江一些县的调查，放高利贷的90.6%是地主、富农，借高利贷的53.7%是贫雇农，45.5%是中农。高利贷一般年利率在30%以上，有的在70%以上，有的甚至在100%—200%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只有老解放区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三分之二的新解放区（三亿多人口）仍未进行土地改革。

解放前，中国几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最高年产量为：煤6187.5万吨（1942年），生铁180.1万吨（1943年），钢92.3万吨（1943年），电力59.5亿度（1941年），纱锭492万锭（1947年），棉纱244.7万件（1933年），机织棉布4500.8万匹（1936年）。而且工业布局和轻重工业比重极不合理，沿海工业占全国工业的73%，重工业产值比重只占工业总产值的28%左右。

粮食最高年产量为3000亿斤（1.5亿吨），棉花最高年产量为1700万担（85万吨），花生298万吨（1933年），烤烟7.7万吨（1937年）。

即使这样低的生产水平，由于战争的破坏，到全国解放时，实际产量也远远低于最高年产量，煤只及最高年产量的50.1%，生铁13.6%，钢17.2%，发电量72.3%，棉纱73.7%，棉布67.1%。

1949年粮食产量为2264亿斤（1.132亿吨），比最高年产量降低25%，棉花降低48%，为889万担（44.45万吨），花生降低57.5%，为126.8万吨，烤烟降低44.4%，为4.29万吨，此外，耕畜减少16%，农具减少30%。

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投机活动猖獗，给人民造成更大的苦难。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5月国民党崩溃前夕，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货增发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

由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凋敝、残破，建国初期的国家财政状况是非常困难的。过去适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工商业不适合新社会的需要，虚假购买力的消失，造成一些工商业停业，工人失业。1950年，国家财政收入中，农业税（公粮）占41%，城市税收占39%，国营企业收入仅占17.1%。支出方面，军费占38.8%，因为对旧军政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行政费占21.4%。两项合占60.2%。而且总收入只占总支出的81.3%，有18.7%的财政赤字。

2. 抗美援朝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由于本国未受到战火破坏，又大发战争横财，侵占了老牌帝

国主义的殖民市场，一时处于巅峰状态。在亚洲，它妄图通过蒋介石卖国集团霸占中国。蒋介石被赶出中国大陆后，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它在中国的惨败，继续以朝鲜为跳板，向我国进攻。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策动南朝鲜李承晚傀儡集团越过三八线，挑起朝鲜内战，过了两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以美国海空军直接进攻朝鲜人民军，同时，违背《开罗宣言》，悍然派第七舰队侵占我国领土台湾。面对美帝国主义气势汹汹的侵略行为，1950年6月28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的讲话中，分析了美帝国主义外强中乾的虚弱本质，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一天，周总理发表声明，痛斥杜鲁门6月27日的强盗言论和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全国各地立即举行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在朝鲜战场上，朝鲜人民军在金日成首率领下，从坚决抵抗迅速转入全面反攻，解放了李承晚统治下92%的人口和90%以上的南朝鲜土地。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败局，纠集英、法等十五个仆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以优势兵力于1950年9月15、16两日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登陆，使朝鲜战局急剧变化。与此同时，美国飞机不断侵犯我国领空，进行侦察活动，扫射和轰炸我东北边境的一些城市和乡村，并在海上炮击我商船。面对美国侵略者的凶恶气焰，毛主席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作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被美国侵略者吓破了胆的刘少奇和林彪害怕惹火烧身，幻想美国会适可而止，反对毛主席的决策。周总理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决策，承担了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艰巨任务。9月20日，周总理提出抗美援朝应是“自力更生，持久作战”，“在战役中，必须集中兵力及火力的绝对优势，围歼被我分割的敌人”的作战方针，得到毛主席的赞同。9月30日，周总理深夜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通过印度政府警告美国政府：“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美国侵略者不顾我国的警告，10月1日麦克阿瑟竟然要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无条件投降，10月2日又下令第二次越过三八线。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再次通知印度大使潘尼加：“如果美国军队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土，中国将不得不加入作战。”10月29日侵略军占领平壤。10月24日，麦克阿瑟命令侵略军向鸭绿江推进，计划在10月29日之前渡过鸭绿江。毛主席应金日成同志10月1日“极盼”中国人民“直接出动援助”的请求，于10月8日下达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根据毛主席的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跨过鸭绿江，在10月25日到31日之间，与朝鲜人民军一起，给予不可一世的侵略军以迎头痛击，迅速扭转了朝鲜战争的形势，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被撤职，5月下旬，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被第二次赶到三八线以南。

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和巩固国防，全中国人民开展了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共捐献飞机3700多架。工人、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劳动竞赛和爱国增产运动，参加竞赛的工人，1950年不过68万人，1951年激增到238万人。58万知识青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由抗美援朝运动而形成的爱国主义高潮，成为我国推动各方面改革和建设的动力。同时，在外交战线上，不断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1950年11月28日，我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表讲话，义正辞严地痛斥了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和对我国的干涉。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侵略者的威风。

在中朝人民军队不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美国侵略者由于军事失败和国内、国际压力，侵略军头目连续换马，仍然无济于事。1951年5月美军头目布雷德利不得不招认：“红色中国

不是侵略成性的国家”。又说：朝鲜战争是“在错误的空间和错误的时间里同错误的敌人所进行的错误战争”。侵略军被迫于1951年7月10日开始在板门店同中朝人民军队代表举行谈判。在谈判中，美帝国主义极力拖延和破坏，并于1951年10月开始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均被中朝人民和军队所粉碎。由于中朝方面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世界革命人民的声援和美国人民的斗争，朝鲜停战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双方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美国侵略军头目在签字后哀叹，他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

抗美援朝斗争的胜利，戳穿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和武器万能的神话，歼灭了美国及其仆从军一百零九万人（其中美军三十九万多人），击落击伤敌机一万二千多架，敌人运往朝鲜的物资七千三百万吨以上，耗费二百亿美元以上。大大鼓舞了世界人民，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反殖、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打乱了美国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计划和部署，保卫了中朝两国的安全，捍卫了亚洲和世界和平。朝鲜战争中，美国大伤元气，从巅峰上跌了下来，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3. 土地改革运动

“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是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更重要的是巩固工农联盟，把农民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为“向资产阶级开火”创造条件。

土地改革从1950年冬开始到1953年初，除西藏、新疆外基本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除东北、华北、西北、华东部分老解放区的一亿六千万人口已完成土地改革以外，其他三分之二以上，共约三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在这些地区，主要矛盾仍然是封建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矛盾，即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和老区土地改革不同的是，战争已经在大陆结束，建立了全国性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国家可以用贷款的方法帮助贫农，以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而1946—1948年老区土改时，战争仍在进行，胜负未分。“因此，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为了做好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1950年6月14日到6月23日，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心议题就是土地改革问题。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这个草案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后，于1950年6月30日，由毛主席公布施行。在6月23日政协闭幕会上，毛主席作了《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的重要讲话。严肃地提出“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的问题，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过好土改“关”，“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

土地改革是一场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伟大革命运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可能没有阻力。从1950年冬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经过八字运动：清匪反霸，退租退押，平分土地和土改复查，到1953年初，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土改。占农村人口60—

70%的三亿以上本来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及其家属，分得了4700万公顷（7亿亩）原来属于地主的耕地，以前每年给地主交地租的六百多亿斤粮食，完全归农民所有。占农村人口20%的中农的利益，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坚决的保护，这就形成了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农民的反封建统一战线。

在土地改革中，采取了保存富农经济的策略。富农在土改以后，每人所保有的土地，一般仍相当于当地每人占有土地平均数的二倍。这就使历来在农村中做为地主阶级同盟者的富农，在土改中保持中立，使地主更加孤立，更有利于消灭地主阶级。

土地改革的结果，大大地巩固了工农联盟，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有力地解放了生产力。经过土改锻炼，农村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组织了起来。农协会员仅中南、华东、西南、西北四个大区统计即达八千八百多万人，大批积极分子入党。粮食生产1951年比1949年增加28%，1952年比1949年增加40%。参加互助合作的劳动力在老区达60—80%，在新区一般为25—40%。1952年全国已有四千多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800多万个互助组，初步显示了组织起来力量大的作用。这一年的冬天，二千万人参加兴修水利，完成17亿土石方工程，相当于挖23条苏伊士运河。

4. 镇压反革命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农村中土改、城市中民主改革、清理中内层和思想改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又是保障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所必要。这一运动是在1950年下半年到1952年进行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军事抵抗已被粉碎，改为利用残余势力在一些偏远地区进行土匪游击战争，煽动一部分反动分子对人民政府顽抗，派遣特务和间谍分子暗杀革命干部，破坏革命统一战线和人民经济事业。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以为“三次大战”、“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活动更加猖獗。这样，镇压反革命运动就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运动开始后，毛主席就指示对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很”。1951年1月17日，又具体指出：“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很，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毛主席又规定镇反必须实行群众路线，“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这就保证了镇反运动的胜利进行。

国家对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罪大恶极、死不悔改的坚决镇压。从1950年—1952年的三年中，我们消灭了二百万以上的土匪，一共杀了五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万，这些人是人民要求杀的，这批人不杀，人民不能抬头，人民也不同意。我们要解放生产力，他们束缚生产力。他们都是五霸，东霸天、西霸天，南霸天，北霸天。监禁和管制了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对普通反革命罪犯采取惩办和改造相结合的政策，到1953年底，已有80%以上的在押罪犯分别投入工农业生产。镇反运动的结果，大大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5.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第一次重大较量——三反、五反

三反、五反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第一次重大较量。

1949年3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并告诫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统一战线，它们的政治代表参加了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受到了国家保护，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濒临破产的私营工商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从1950年1月到1951年12月的两年中，根据上海、天津、北京、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沈阳八个大城市的统计，私营工商业增加了九万二千多户，即增加27%。特别是私营工业，1950年——1952年的三年中，总产值增加70%左右。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也逐年增加。

但是，资产阶级由于它的阶级本性决定，不甘心被限制地位，恩将仇报，用“五毒”（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形式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的进攻。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则是资产阶级进攻引起的恶果。这场斗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妄图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霸占人民革命胜利的果实，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不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国民经济就无法恢复，就不能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1951年底，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中，进行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接着，又在私营工商业中，进行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三反”运动开始后，一个月时间，仅中央机关就发现了几百个大贪污犯，贪污总额一千亿元。在地方，天津地委揭露了刘青山（35岁，雇工出身，十五岁入党，前任地委书记）、张子善（37岁，学生出身，19岁入党，现任地委书记）那样的大贪污犯，这两个人在白色恐怖和革命战争中表现都很英勇，但进城后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勾结私商贪污盗窃国家资财130多亿元，被判处死刑。在五反运动中，破获了象“星四聚餐会”那样的非法资本家组织，它最初由重庆市私营钢铁机器业的六家大工厂的资本家发起，以后发展到54个厂，并组织了“星五聚餐会”，“星六聚餐会”，“造船小组”，“十一厂联络处”和“会计师座谈会”，成为一个庞大的垄断组织。如“星五聚餐会”垄断了成渝铁路的加工订货，“造船小组”垄断了西南地区的造船业。他们一方面采取各种手段侵占国家资财，另一方面又敲扣和吞并中小工厂。这是不法资本家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一个典型。还有的不法资本家，丧心病狂地制造假药，破坏抗美援朝运动。这些都说明资产阶级进攻的严重性。

毛主席为“三反”、“五反”斗争制订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并在1952年6月6日针对李维汉的错误，明确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从1951年底到1952年上半年，在三反中，有4.5%的国家工作人员因犯了不同程度的贪污、浪费和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行为而受到处分，特别严重的受到法律制裁。这就大大纯洁了国家机关。在五反中，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沈阳、西安、重庆、南京等九个大城市审查了四五十万多户私营工商业者，其中有76%有违法行为。这就“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于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

通过“三反”、“五反”运动，“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6. 意识形态领域里对资产阶级进攻的反击 ——对电影《武訓传》的批判

在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便呈现出空前激烈的状态，收入第五卷的毛主席对反动电影《武訓传》的批判，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利用文艺形式猖狂进攻的有力反击。

毛主席历来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

1949年7月，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下，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毛主席亲自到会讲话，周恩来同志作了政治报告。会后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推陈出新”的题词。1949年10月，《人民文学》创刊号又发表了毛主席“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题词。

但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刘少奇和周扬等“四条汉子”，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在文艺界兴风作浪，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周扬在文代会上鼓吹超阶级的“国民性”文学，夏衍在上海叫嚷要写“着重表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品。反动文人姚克编剧，国民党“永华影业公司”在解放前夕开始摄制的反动电影《清宫秘史》，解放以后，在刘少奇、周扬包庇下，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刘少奇公然把这部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影片放映后，毛主席在1950年3月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清宫秘史》虽然停映了，但由于刘少奇、周扬的阻挠，始终没有对《清宫秘史》进行批判。

《清宫秘史》上映的前后，1950年1月，周扬、夏衍、阳翰笙等人，又策划摄制反动电影《武訓传》。1950年12月，《武訓传》拍摄完成，周扬非常欣赏，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流了泪。”他亲自审定批准，在全国放映。

电影《武訓传》内容极端反动，情节荒诞，形象丑恶。它狂热歌颂地主阶级及其走狗武訓，反对和污蔑农民革命战争。它露骨地美化地主恶霸，把杨树坊那样的恶霸乔装打扮成“为穷孩子争取教育机会”的“贤明士绅”。反动地主在影片中成了“慈善为怀”的“救世主”。影片对武訓这个地主阶级的狗奴才，百般美化为“街头卖艺，市上售歌”，“行乞兴学，苦操奇行”的“英雄”，而农民起义者却成了“杀人放火”的“乌合之众”。以此反对革命，宣扬改良、投降。不难看出，当时消灭地主阶级的土改斗争正在猛烈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正在进行，影片是直接为刘少奇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服务的，是为了破坏三大革命运动的。

《武訓传》在各地上映后，受到工人阶级、革命干部和各阶层劳动人民的唾弃和抵制，许多人无法看下去，中途退场。他们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停映《武訓传》。1951年5月20日，毛主席为《人民日报》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訓传〉的讨论》的社论，对这部影片反对阶级斗争，宣扬阶级投降的反动实质作了马列主义的分析，尖锐地批判了“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刘少奇、周扬一伙，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

产党”。毛主席号召开展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彻底澄清思想上的混乱。在毛主席的指引下，无产阶级奋起批判《武训传》，从1951年5月下旬开始，全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干部和各阶层劳动群众，举行各种形式的批判会、讨论会、辩论会，愤怒批判《武训传》。在毛主席的倡议下，1951年6月，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经过二十多天的调查证明，武训是个以“办义学”为手段，拥有各种特权，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封建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给资产阶级利用文艺形式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以坚决的回击，在上层建筑领域里有力地配合了三大运动的开展。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迅速好转。毛主席关于三年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预言，到1952年下半年已经实现了。同1949年相比，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7.46%，国家财政结余七亿七千万元，通货膨胀制止了，物价稳定了，产业工人实际工资提高60—120%，农民购买力比1949年提高78%。主要工农业产品，1952年原煤6352.8万吨，生铁190万吨，钢134.9万吨，水泥286.1万吨，棉纱361.8万件，棉布8927.3万匹，糖46万吨，卷烟265万箱，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52年粮食产量3087.9亿斤，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加87.9亿斤，棉花26.1亿市斤，比最高年产量增长53.6%。这一切都说明，党在恢复时期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这就为下一个时期，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打下了稳固的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

二、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

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时，我国工农业生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当时的生产水平仍然是很低的，更重要的是在生产关系中存在着多种所有制。在工业生产中，国营工业——这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例，1949年为34.2%，1952年上升到52.8%。公私合营的工业产值，1952年占5%。私营工业的产值，1949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3.3%，1952年仍占39%。商业中，国营商业的比重更低，1952年，国营商业只占全社会商品零售额的15.8%，合作社商业占18.3%，私营商业却占65.6%。1952年底，全国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者只有21万多人，而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业者却有700多万人。在广大农村中，土地改革完成后，消灭了地主阶级的封建所有制，变成了农民的小生产的私有制，一家一户是一个生产单位；互助合作运动虽有一定发展，但主要是常年和临时季节性的互助组，1952年在全国各地不过成立了三、四千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小生产的私有制，小生产者仍是汪洋大海，广大农村又迅速出现了新的两极分化现象。多种经济的存在，的确如毛主席讲的：“**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这个问题，仍然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

1953年6月15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8月，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在周恩来同志所作的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

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在总路线的灯塔照耀下，到1956年11月，在全国范围内提前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从1953年到1956年，阶级斗争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在党内，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在党外，批判了梁漱溟、胡适的唯心主义反动思想，揭露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展了肃反运动。到了1957年，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又展现在无产阶级面前。这在国际上，就是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修正主义；在国内，就是党的整风和反右斗争。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就是在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1、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

每当革命的转折关头，毛主席都高瞻远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我党制订了一条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对建国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主要内容已有规定，指出：“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但是，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疯狂反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刘少奇跑到天津，一头栽到资本家的怀里，鼓吹“剥削有理、剥削有功”的谬论。随后，又抛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修正主义纲领，狂叫“中国今天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说“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青年时代”，要无限制地“大发展”。他反对依靠工人阶级，说“工人阶级也是不可靠的”，要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作斗争”。刘少奇还提出“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刘少奇叛徒集团的成员薄一波在1952年12月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在政策上为发展资本主义开绿灯。薄一波还写了《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反对农业合作化道路，说农业合作化“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刘少奇一伙就是这样为发展城乡资本主义奔走呼号，疯狂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针对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谬论，毛主席在1953年连续写了《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等重要文章和讲话（都收入五卷），给刘少奇一伙以迎头痛击，指出他们的倾向是“资本主义倾向”，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他们的错误“是原则性的错误”，“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问题”。“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但是，刘少奇阳奉阴违，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问题上，又一再暴露了他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本质。

2、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是以阴谋手段分裂党，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党集团。

高岗，1905年生，是个大野心家、阴谋家，1926年混入党内，抗日战争期间窃取了西北局书记的要职，发展个人势力。1945年到东北后，背着党中央，组织黑班底，把东北当成他的独立王国。建国后，他为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进行阴谋活动。高岗极端腐化堕落，荒淫无耻，被陕北人民骂为“骡骡子”，完全是刘青山、张子善一类坏分子。1953年，高岗调到中央担任计划委员会主席以后，和饶漱石勾结起来，反党活动更加疯狂。他鼓吹反动的“军党论”，胡说“党是军队创造的”，“枪杆子上出党”；又鼓吹“两党论”，胡说我们党分为两个，一个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另一个是“白区的党”，说他是“根据地和军队党”的代表人，应该掌管主要权力，要改组党中央和政府，由他作党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国务院总理。高岗反党联盟被揭露后，高岗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而自杀表示他对党的最后背叛。

饶漱石是个大叛徒、大野心家，1925年入党，1931年叛变自首，受刘少奇重用，1940年被安排为东南局副书记，积极推行王明右倾投降路线。1943年到1953年十年间，多次为了夺取权力而在党内使用欺骗手段。他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和华东局书记期间，推行向资本家、富农投降的右倾政策，勾结窃据上海市公安局长职务的杨帆，违抗中央镇反政策，竭力保护反革命分子。1953年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后，和高岗结成反党联盟。这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还有窃取山东局书记的尚明，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峰，以及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等人。

高饶反党联盟的特点是用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的阴谋活动，在1953年6月——8月的中央财经工作会议期间达到顶点。他们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另立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揭露和批判了高饶反党联盟。1955年3月，毛主席主持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高、饶开除出党。毛主席在会议上讲了话（收入五卷），总结了和高饶反党联盟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加强党的团结，反对分裂党的活动，共产党人要光明磊落，绝不可以象高饶那样玩弄阴谋手段。这对我们党的建设和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反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和粉碎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

3、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提出的。这个计划于1955年7月30日，在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实际上，它在1953年就开始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用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数是766.4亿元，折合黄金七亿两以上，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是旧中国所不可能想象的。建设项目按投资限额计算，限额在300万元以上的有694个建设单位，其中重点项目156个，限额以下项目有6000多个，其中工业项目2300个。

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56年就提前完成了。1956年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达586亿元，超过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指标。1956年钢产量446.3万吨，煤产量达1.3亿吨，比1952年增长一倍；到1957年，全国发电量达193亿度，发电设备容量463.5万瓩。限额以上项目完工

和部分完工投入生产的工业项目537个。改善了内地的工业布局，新建立了汽车、拖拉机、飞机等制造业基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8%。这样，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1949年是17%，1952年上升到26.7%，1955年又上升到33.6%，1957年再升为56.5%。生产资料工业（重工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1949年仅占28.8%，1952年为39.7%，1955年上升为46%，1957年再升为48.4%。这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4、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改革以后，农民中出现了两方面的积极性，一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对于占农村一亿二千万户中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来说，只有走合作化的共同富裕道路，才是金光大道。土改以后，如果不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以土改为基础的工农联盟发展成为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农业的个体经济就会同社会主义工业化发生矛盾，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强大的基础。同时，个体农户经不住风吹雨打，不论新区或老区，都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一些农户再度走上贫困破产的道路。

毛主席早就为广大农民规划了合作化的道路。土改以后，党引导农民经过互助组（临时的和常年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土地入股分红，主要生产资料私有）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全部按劳分配），循序渐进。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经历了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在不断排除刘少奇的干扰、破坏中取得胜利的。

还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就积极组织了互助组。毛主席热情支持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1951年7月，刘少奇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指责山西省委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报告，反对毛主席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路线，污蔑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1951年9月，毛主席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在12月15日，专门写了《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的批示（收入五卷），连同草案发给各地试行，给刘少奇以迎头痛击。这个草案经过试行，作了部分修改后，于1953年2月15日作为中央正式决议公布。这时，组织起来的农民，华北地区占全体农民的60%，东北达70%，全国已有一万四千多个农业合作社。针对刘少奇右倾机会主义的言论，1953年10月——11月，在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两次谈话，批判了“稳步不前”的右倾思想，驳斥了刘少奇鼓吹的“确保私有”、“四大自由”的资本主义谬论。明确指出：“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并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书记都要“亲自动手”，抓互助合作。1953年12月16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并且具体规定各大区的发展数字。在决议的鼓舞下，到1955年6月，全国已有六十多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在这时，刘少奇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召开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停、缩、整的反动方针，并亲自批准大砍农业合作社的计划。他首先强迫浙江省委砍掉一万五千个合作社，在以后的两个多月内，在全国又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毛主席回到北京后，于7月31日在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重要报告，痛斥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责难和污蔑，科学地总结了我国农业合作化的经验，深刻阐明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关系，具体规定了

农业合作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篇报告，驱散了刘少奇的妖风迷雾，照亮了农业合作化的航程，在中国大地上很快出现了农业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高潮。

党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报告，在1955年7月31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在毛主席报告发表后的四个月内，全国又新成立了五十九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到1955年11月底，全国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达4940多万户，占总农户40%。1955年10月，党中央召开了七届六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大辩论做了总结。同年，毛主席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主持编辑了包括176篇材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序言和按语，对农业合作化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都作了明确详尽的指示。到1956年6月，全国一亿二千万农户中的一亿一千万户组成了99.2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占总农户91.7%，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62.6%。至此，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比最初预料的十五年提前了十一年，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胜利完成，使农村一家一户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经济转移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上。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农业生产的面貌。毛主席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同时，高瞻远瞩，着手制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规划。1955年11月间，毛主席先后同十四个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交换了意见，共同商定了“十七条”（收入五卷）。1956年1月，毛主席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商量之后，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这就是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6年1月2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了这个纲要草案。毛主席在会上说，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业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由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农业发展纲要的鼓舞，1956年虽然受到解放以来最大的自然灾害，受灾面积二亿三千万亩，受灾人口七千万人，粮食产量仍达到3650亿斤，比上一年增加154亿斤。1957年粮食产量再增至3700亿斤，比1952年增加612亿斤，增长19.8%。棉花产量达到3280万担，比1952年增加673万担，增长25.8%。全国有65个县、市的粮食，64个县、市的棉花分别达到纲要指标。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大解放了生产力。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极大地推动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发展。手工业个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不小的比重，1952年，手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13%（不包括农民手工业7%的产值），当时农民所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70—80%是手工业产品。而且我国手工业中有很多特殊技术的品种，是驰名世界的工艺产品。我国城市手工业劳动者有700多万人，加上小商、小贩等其他独立劳动者共约一千万人。个体手工业经济同社会主义工业化也有矛盾，它本身也已经出现两极分化，所以必须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组）有220万人，占手工业总人数27%。1956年3月5日，毛主席对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了指示（收入五卷），根据这个指示规定的政策、方针，全国的手工业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有了进一步发展，到这一年年底，参加社（组）人数达90%以上。这一年手工业总产值达117亿元，比1952年的73.1亿元增长60%以上，达到了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生产指标。

农业、手工业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小商品经济变成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时，私人工商业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一年私人工业产值（包括国家加工、订货、收

购、包销的产值在内），占全部现代工业产值的35.1%，工场手工业产值中私人资本主义所占比重为55.9%。全国私营工业职工1949年约有160多万人，12万3千户；私营商业总户数1950年约402万户，从业人员662万人。主要是小型户。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采取没收的方法，而是采取了和平改造的政策，也就是马克思、列宁设想的赎买政策。这是中国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改造的办法，是实行逐步过渡的方针。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在工业中是加工订货，在商业中是经销代销。1950年调整私营工商业时，建立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制度。1953年到1954年，国家对粮、棉、油实行计划供应后，原来经营这方面商品的私营商店，即变成了国营商店的经销代销店。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和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的外部合作，未触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因此，不能使私人经济适应国家的计划经济，解决的办法是实行公私合营，逐步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1953年，公私合营还只有一千多户，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5.7%，1953年9月，毛主席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阐明了“**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1954年，公私合营有较快发展，到1955年下半年，公私合营工业产值和私营工业产值已经相等。在私营工业产值中，加工订货部分占82%，资本家自产自销部分只占18%。私营商业在社会零售额中所占比重从1952年65.6%下降到18%。

1955年冬季，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资产阶级感到自己愈来愈孤立。毛主席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会议上，向他们指出前途，鼓励他们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下决心使自己彻底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6年初，在形势逼迫下，一厂一户的公私合营，由于私营工厂太小太落后，不能适应生产和经营的改组和改造，也不能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全面规划和统筹安排，这就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形式，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供、产、销不再由各个厂商筹办，全部由国家的专业公司领导和安排；资本家不再根据企业盈余领取股息和分红，企业则按照公私双方协定的资方原有资本定额，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给予资方每年拿取5%的定息，并且按照资本家本人的实际能力，适当安排工作，对其工资也有适当的“保留”照顾。至此，资本家除了保留“定息”的尾巴，同原有资本已不再有其他的关系了。到1956年底，原来的资本主义工业，按产值计算，已有99.6%转为公私合营；私人商业，按户数已有82.2%转为国营或合作商店（小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这样的深刻的革命，由于贯彻了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社会财富没有遭到损坏，社会生产没有下降。1956年公私合营工业总产值达191亿元，比1955年增加约32%。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小组）的零售额达110亿元，较上一年增长15%。马克思提出过，列宁设想过，但未能实现的对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我国实现了，这必将对世界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5、反对梁漱溟、胡适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右派言论的斗争

对梁漱溟、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是五十年代初期对反动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批判的继续和发展。

在1953年9月16日——18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政协委员列席）上，面对以梁漱溟为其代言人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放肆挑衅，毛主席带头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梁漱溟是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典型代表。此人1893年生，广西桂林人，其父梁济是满清遗老，张勋复辟破产后自杀。梁漱溟曾任北大教授，抗战时期任国民参政员、民盟秘书长、民盟机关报《光明报》社长。1950年来北京，被特邀参加政协全国第二次会议。

梁漱溟解放前标榜第三势力的代表，实际上他在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一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在二十年代初期，他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反对我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他发表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极力推崇封建文化，要用孔老二的封建文化“去救”中国人和西洋人。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个信奉孔子，张口“伦理”，闭口“情谊”的梁漱溟，却写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向蒋贼献“一洗旧染于欧人俄人之污”的反革命大计。

梁漱溟和国民党CC派头目陈立夫、政学系头目张群、山东军阀韩复榘、反动民社党政客、美国特务张东荪关系密切。梁漱溟在北洋军阀时代，和张东荪、张君劢等同属于梁启超研究系的人，投靠军阀。在国民党反动派五次反共“围剿”时期，梁漱溟抛出了“乡村建设理论”及其他反动谬论，公开提出“要消灭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代替”，并在韩复榘支持下，在鲁西南进行“试验”。充当国民党文化“围剿”的马前卒。他否认中国社会中存在着阶级，胡说“中国社会特殊”，“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主张建立超阶级的“无色透明政府”。他否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竟然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非常庆幸的事，我感谢天谢地”。他鼓吹在农村建立所谓“自卫队”，实际是反动的地主武装，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在鲁西南一地就训练了十五万人。1937年他代表韩复榘跑到日本，回来后，鼓吹“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卖国谬论。~~胜利~~抗日战争时期，梁漱溟以民主同盟秘书长的身份参加旧政协，在我党和国民党和谈期间，为蒋介石散布假和平烟幕。1946年10月，蒋介石准备召开伪国大，发动全面内战。梁漱溟和李潢、莫德惠三人，配合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提出了一个所谓《折衷方案》，妄图要我方撤出东北铁路沿线二十个县，为蒋介石在东北向我进攻让开一条路。我方代表周恩来同志当场指出这是以第三势力名义配合国民党进攻，并揭发梁漱溟说：“过去人家说你伪君子，今天我才知道你是真小人！”1949年初，蒋介石又玩弄假和平阴谋。梁漱溟在重庆写了一篇《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的反革命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他粉饰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实质，为蒋介石开脱罪责，胡说：“今天好战者既已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妄图保存国民党残余势力，卷土重来。解放后，梁漱溟是政协委员，在全国人民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新形势下，他跳出来抗拒社会主义改造，他佯装代表“农民”，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胡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说“农民太苦”；他攻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

毛主席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的讲话中，淋漓尽致地驳斥了梁漱溟的反动谬论，揭露了他的丑恶历史和反动阶级本质。毛主席指出：“批判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梁漱溟所编造的“农民生活苦”的胡话，在当时，是一些人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借口。1957年2——3月，毛主席在

最高国务会议的几次讲话中都谈到这个问题，谭震林同志专门对这个问题作了调查。铁的事实证明，解放后农民生活有很大改善，土改的胜利，三亿无地农民获得了七亿亩土地，免交六百亿斤租粮。1950年到1956年，国家水利投资30多亿元，贷款80多亿元，救济款13亿多元，加上其他支援农业项目，几乎和农民在七年中交给国家的农业税相等。1951年到1957年增产粮食1400亿斤，基本上都留在农村。1949年全国农副业生产总值325亿元，农村人口4.7亿人，农民每人平均产值约70元。1956年全国农业人口5.28亿人，每人平均产值110元，比1949年增加40元。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当然，农村有些地区有灾害，有些农民碰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困难户是有的。叫喊农民苦最厉害的是富裕中农，因为他们以此为借口反对合作化。地主也叫苦，他们比之土改前当然“苦”了，梁漱溟就是他们的政治代表。

批判梁漱溟后不久，毛主席又发动了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胡适（安徽徽州人），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他青年时代留学美国，是反动哲学家杜威的门徒。“五四”运动前回国，宣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后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党反动政府驻美国大使。抗日战争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参加伪国大，担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考试院长。他自称是“作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解放后死于台湾。胡适这个买办文人、美国洋奴、反动政客，他的反动政治面目虽然早已被人识破，但他的反动学术思想，解放初期在学术界还很有影响。俞平伯在研究《红楼梦》中的唯心论观点，就是直接从胡适那里承袭过来的。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的深入，必然要发展到对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的批判。

俞平伯是北大教授，早年即跟随胡适对《红楼梦》进行烦琐的考证，也从王国维那里接受了“色空观念”、“情场忏悔”的观点，被认为是几十年的“红学权威”。解放后，俞平伯在周扬的纵容、支持下，经改头换面，抛出了旧作《“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简论》等书，公开贩卖胡适的反动唯心主义学术观点。1954年9月，山东大学《文史哲》发表了该校学生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批判了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毛主席对这篇文章很重视，而《人民日报》却以种种借口不予转载。以后，这两个青年又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驳斥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毛主席读了这两篇文章后，于1954年10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并附有李、蓝所写二文。指出这是一场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批判了刘少奇、周扬一类“大人物”对“小人物”反潮流精神加以阻拦和压制，而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毛主席明确指出，对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治上应采取团结的态度，但对他们的错误思想应当批判，而不应当投降。批判胡适为代表的反动唯心主义学术思想，是思想战线一次重大斗争，它极大地推动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为思想政治战线上进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

6、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反运动

胡风，是一个披着“文化人”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原名张光人，又名谷非，湖北人。大革命时曾加入共青团，1925年当了逃兵。曾在江西“剿共”军中做过反共的政治工作。后又去日本混了一个时候，回国后混进上海左翼文化团体，从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在武汉和重庆时

期，和国民党许多特务头子有联系。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如绿原²是国民党特务，有些则是反动军官、托洛茨基分子、叛徒和自首变节分子，是一个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伪装革命，潜藏在革命队伍中，有些窃取了“共产党员”称号，担任重要职务，暗地里却干着反革命勾当。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三十万字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疯狂攻击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和政策，攻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与工农兵结合、思想改造、民族形式和为政治服务污蔑为“放在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与此同时，纠集同伙一齐向党进攻，妄图从夺取文艺界的领导权开始，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55年1月，毛主席决定公布胡风的《意见书》，在文艺界开展批判。胡风看形势对他们不利，组织退却。胡风在同年1月写了一份假检讨“我的自我批判”，2月作了修改，3月又写了“附记”，然后抛出来作为烟幕。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人民日报》在1955年5月13日公布了原胡风集团成员舒芜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另附有胡风的假检讨。毛主席为这份材料写了编者按语。接着又在5月24日，6月10日公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三批材料。6月15日，出版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主席为这些材料写了序言和按语（部分收入五卷）。

毛主席写的序言和按语，彻底剥下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伪装，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真相，阐明了当时斗争的情况和部署，规定了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方法和策略，是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对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三批材料公布后，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斗志，迅速形成全国性的揭发批判运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同时，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我党领导肃反运动的路线是：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坚持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坚持“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原则，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严禁逼、供、信，遵守革命法制。在这条正确路线指引下，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中，经过一年左右的斗争，清查出一大批反革命分子，仅1955年查出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就有八万一千多名。在运动中，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有十九万之多，其中现行犯有三千八百多个。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在运动中搞清了各种政治历史问题，丢下包袱，轻装前进。人民群众提高了识别暗藏反革命的能力，进一步纯洁了革命队伍，削弱了反革命势力，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7. 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怎样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我国的建设事业搞得快些好些，这个问题一直是毛主席所深思熟虑的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就指出，我们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毛主席说，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要经过五十年。到了1956年，毛主席又提出，要用五、六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美国，“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后来，1963年，毛主席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展情况，又为我们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规划。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宣布了发展